

社会保障、自我保障与居民生活质量

——基于居民消费视角的实证

王 平

(甘肃政法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兰州 730070)

摘 要:我国经济结构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完善的保障制度是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保证。为此必须建立多层次多样性的保障体系,这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保障民生的必然选择。文章从理论上梳理了社会保障、自我保障、资产跨期配置“三轮驱动”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逻辑机理,认为从经济层面看,居民的生活质量是与居民幸福相关的一个概念,而幸福与效用满足程度有关,居民消费是满足消费者效用的主要路径。这一逻辑的理论归纳为本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理论支撑下,运用 2000-2014 年省级城镇居民面板数据,沿着从被动性保障到主动性保障的主线,以社会保障、自我保障、跨期资产配置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保障与自我保障对我国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影响几乎相当,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居民生活质量受自我保障影响较大,而中西部地区居民则对社会保障依赖较大;跨期资产配置保障并未帮助城镇居民提高生活质量,这可能跟“低收入者”是当前我国消费贷款主力军有关;居民主动性收入高低、生活习惯是通过消费进而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但较高教育水平却并未给居民带来高品质的生活,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一现象越明显。根据这些研究结论,提出的政策建议为:我国现阶段要全面覆盖社会保障的“兜底”功能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鼓励居民多渠道筹措资金,积极提升自我保障能力,从而提升生活质量;要合理适度的发展消费信贷,通过资产跨期配置平滑生命周期内生活质量的时间差异;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与制度,形成全社会尊重劳动,激励居民通过各种智力与非智力劳动来创造幸福,从而提升生活质量。

关键词:社会保障;自我保障;跨期资产配置;消费贷款;生活质量;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80(2017)04-0032-16

一、问题提出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也是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做好居民生活保障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3XMZ030)

作者简介:王平,博士研究生,副教授(E-mail:wp6685@gsli.edu.cn)

作是事关居民福祉、生存权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更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在保障和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仍然改变不了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现实。跟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国力仍然有限,尤其是在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下,人均经济总量很低,可调动的资源有限。近年来,虽然国家逐年加大了社会保障的支出,但在这个特定的经济阶段,我国居民生活保障尚不具备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支付的条件。为保障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必须依靠居民个人、社会及在此基础上的金融手段调剂“三轮驱动”来实现。那么,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自我保障及资产跨期配置保障各自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答的关键问题,其基本目标是通过理论分析厘清逻辑关系,并从消费视角实证分析这一问题的基本存在事实。国内外研究者对于相关命题已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这些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

一是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主流的消费函数理论,从凯恩斯(J. M. Keynes, 1936)绝对收入假说(AIH)^[1]、杜森贝利(J.S. Duesenberry, 1949)相对收入假说(RIH)^[2]、莫迪里安尼(F. Modigliani, 1954)生命周期假说(LCH)^[3]到预防性储蓄假说(Dynan, 1993)^[4]及霍尔(R.E. Hall, 1978)引入理性预期理论提出的随机游走假说(REPIH, 理性预期的持久收入假说)^[5]对此均有涉及,这些研究也成为后来者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绝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是现期收入水平的函数,其关系用居民消费倾向大小表示;与之相反,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水平更多取决于过去的最高和最低收入及其他居民消费水平高低,其原因是居民消费存在示范效应和攀比效应;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居民的消费水平是由其一生的收入总水平决定的,居民可以通过跨期资产配置来平滑一生的消费;预防性储蓄假说认为,居民为了预防未来的不测,会选择增加当前储蓄来应对未来收入减少的风险。对于居民通过金融资产的跨期配置平滑消费行为需要将消费与金融问题结合研究, Samuelson(1969)^[6]、Merton(1969^[7]; 1971^[8])、Courinchas & Parker(2002)^[9]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将风险资产及负债纳入到了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为消费金融的研究建立了重要的基础。后来的研究者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10-11]、住房资产与居民消费的关系^[12-14]、居民储蓄存款及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15-16]、家庭负债与消费^[17]等消费金融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主流的消费函数理论从不同视角对消费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探讨,是探讨消费问题的理论来源,也是后来的研究者梳理社会保障与消费问题的基本依据,更是我们从消费视角研究社会、自我保障水平及其资产跨期配置与居民生活质量关系命题的重要依据。正是基于这些理论基础, Feldstein(1974)进一步分析认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入和挤出效应,其基于美国的实证数据支持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效应^[18]。即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居民消费越多,消费提升促进了生活质量的提高。 Leimer & Lesnoy(1982)的进一步研究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即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将减少居民消费^[19]。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大致跟国外的研究结论相似,姜百臣(2010)^[20]、段景辉(2011)^[21]等的研究

得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结论,刘新等(2010)学者的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具有抑制作用^[22],他们研究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跟社会保障存在区域、群体的异质性有关。如肖攀等(2015)^[23]的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着区域的异质性。

二是对于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 J.K.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首次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认为生活质量体现了人们生活的舒适、便利程度及精神上得到的愉悦和乐趣^[24],Arnold(1991)将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概括为主观感受与客观条件两方面^[25],具体包括个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自尊、身体健康状况^[26],内容涵盖能力、感知、环境、心理等四个方面^[27]。在国内,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2012)编制的城市生活质量指数(CCLQI)最为全面和综合,高度概括和涵盖了主流的一些研究结论,将影响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因素概括为生活水平、生活成本、人力资本、社会保障、主观感受等方面的综合体系^[28]。对于特定群体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该领域研究最为关注的议题。李建新等(2012)利用二分的 logit 模型从多维度考察了城市空巢老人的生活质量状况,发现不管是生活自理能力、生活满意度还是心理健康程度及自身对自我健康的评价,空巢老人生活质量要低于非空巢老人^[29];梁增贤等(2015)对城市旅游业非正规就业者的研究表明消费与安全、家庭生活、工作状况、休闲娱乐、生活条件、社会交际、能力发展、工作前景等八个方面能解释他们生活质量是否满意、幸福的大约有 60%,但人口学特征和从业状况似乎对生活质量影响不大^[30]。我们对此逐一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因素大多都是由居民消费能力决定的。正因为这样,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也显示:高生活成本是拖累城市生活质量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房价的上涨、城市规模过于庞大、通胀预期均影响到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政府应当在遏制生活成本上升,管理好通胀预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8]。

三是居民消费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根据前述的消费函数理论可知,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而学者们的研究也证实,收入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变量,于是收入通过影响消费能力进而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蒋青(2004)通过构建影响生活质量的模型分析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并运用四川省 2003 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证实收入是影响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城镇居民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评价较好,介于满意和比较满意之间^[31]。吴静(2009)构建了衡量幸福的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发现保障、健康、环境等是影响居民幸福的重要因子,而我国社会保障等方面依然薄弱,是造成幸福感低的重要因素^[32]。何强(2011)为了厘清经济因素对居民幸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对全球居民人均收入与幸福度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提高居民幸福的重要因素,但居民幸福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永远单调递增^[33]。

对于如何通过加强保障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方面,相关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社会保障方面,对于资产跨期配置之一的预防性储蓄也是研究的热点。方显仓等(2013)建议通过加大社会保障投入、降低个人社会保障缴费率、促进社保基金增值是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现期消

费从而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34]。社区服务特别是医疗服务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也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路径,要多措并举改善医疗服务的供给模式,通过多元供给模式缓解我国医疗资源短缺是解决现阶段我国居民生活质量问题的路径之一^[35]。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的体系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适应老龄化、城镇化及就业方式多样化的需要,也是未来努力的方向^[36]。

从以上研究成果看,国内的现有研究对社会保障与消费研究较多,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相关研究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注重社会保障但对自我保障及金融调剂下的资产配置很少涉及,未能契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二是生活质量的研究多从医学等领域入手,重视个人感受这些表象问题,却忽略了其背后根本性的决定性要素——收入,更没有深入探讨造成主观幸福感不足、生活质量低下的深层次经济原因。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契合我国国力及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实际,将社会保障、自我保障及金融手段下的跨期配置结合研究,提供了全方位研究生活质量的新视角,特别是对相关理论的梳理和完善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支撑。在实证研究方面,将主要因素作为核心变量,其它因素作为辅助变量,既保证了结果的可靠性,又增强了结论的可解释性。以经济因素的消费水平来衡量生活质量,为从经济层面研究生活质量开拓了新思路。

二、理论与逻辑机理分析

(一)消费:生活质量提升的途径

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话题,不同学科对其内涵有不同的界定。生活质量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医学术语中,主要指健康质量,包括生理及心里的健康状态;经济学中,最早界定生活质量的是美国经济学家 J.K.加尔布雷思,后来的研究者设计了一整套包括主观感受和客观条件的指标来评价生活质量,其中消费、收入、社会保障是最重要的指标因子。从经济层面看,生活质量高低可用居民是否幸福来表示。然而,什么是幸福呢?其实经济学对幸福的定义在早期的经济学创始人边沁那里就已经给出了概念。边沁认为,所谓幸福就是人们的欲望得到了全部或部分满足时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愉悦或舒服的感受。保罗·萨缪尔森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大师,更是给出了一个广为称颂的幸福方程式,即幸福=效用/欲望。从该方程式看,幸福是由居民效用满足程度决定的,而要满足效用,消费能力是最为基础性的决定要素。也正因为如此,微观经济学中将效用满足状况作为衡量居民幸福程度的主要因素,认为效用满足程度越高,居民会越感到幸福,而效用的满足主要依靠居民的消费来实现。这里的幸福我们可以看成是高生活质量的表现;社会学中对生活质量的界定比较宽泛:一是认为生活质量是一定条件下人们客观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37],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人口生活条件的综合状况^[38],用影响物质或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如衣食住行等衡量;二是认为生活质量是人们一定条件下主观的获得感,是对生活各个方面的主观评价和总结^[39],常常用反映主观感受的指标去衡量;三是认为生活质量是主观感受和客观条件综合结果的反映,这种观点是对前

面两种看法的结合,评价生活质量时应该既包含客观指标又包含主观指标^[40]。对于医学、经济学及社会学对于生活质量概念的描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各学科对生活质量概念界定示意图(图1)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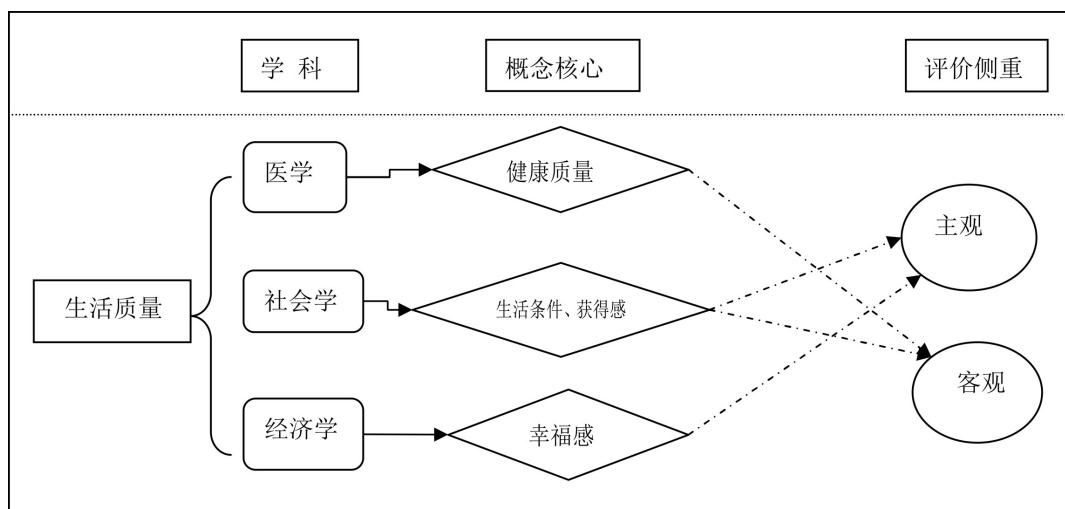


图1 相关学科对生活质量概念界定

根据以上就各相关学科对生活质量概念的描述及图1的归纳分析可以看出:医学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强调健康状况,而健康状况在医学领域可以运用其专业的手段和指标检测,结果本身较可靠;社会学评价生活质量涵盖范畴最广泛,既包括主观感受,也包括客观条件,但评价本身比较模糊,指标和涵盖的内容界定困难;经济学定义生活质量从字面来看强调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但评价过程又以客观条件为主要指标,操作过程较为实用、可行性高。因此,本文以经济学理论为核心认为,生活质量从字面来看是一种主观的幸福感,但幸福感的获得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需要运用客观的经济指标去衡量,用收入、社会保障、金融资产配置等经济指标是可行而实用的。

对于生活质量水平的衡量,中国社科院经济实验研究所发布的城市生活质量报告中,用城市生活质量指数(CCLQI)来综合评价居民主观对生活质量的感受,内容包括生活水平、生活成本、人力资本、社会保障、主观感受等方面(见表1)的满意度。从表1的生活质量衡量指标可以看出,生活质量是与社会保障及内外部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其影响因素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强调个人心理感受,客观方面强调物质、环境等与之相关的因素。不管是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消费率、人均储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财富增长、文化娱乐消费及社会保障覆盖率、医保覆盖率等与居民消费、社会保障状况息息相关,既包含了社会保障、个人保障水平,也包含了资产配置。有鉴于此,本文认为生活保障程度既涵盖主观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又包含客观的收入、环境等因素。因此,本文主要选取社会保障、自我保障、资产跨期配置保障作为影响生活质量的核心因素和变量,并将相关的收入、教育等作为控制性因素和变量进行考察。而这些因素恰好是消费理论所认为的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从消费视

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是可行的。

表 1 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指数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生活水平指数	收入水平	消费率（消费和收入的比率）
		人均财富（人均储蓄+人均房产值）
	生活改善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财富增长
		人均消费增长
生活成本指数	生活成本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住房销售价格指数
		通货膨胀率
人力资本指数	人力资本	房价收入比
		教育资源（用万人学校数和万人教师数衡量）
社会保障指数	社会保障	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
		社保覆盖率
		医保覆盖率
		失业保险覆盖率
生活感受指数	生活便利	交通便利化（用人均道路面积、万人公共汽车、万人出租车数量表示）
		娱乐便利化（用万人影（剧）院数表示）
	环境优美	医疗便利化（用万人床位数、万人医院数、万人医生数表示）
		人均绿地面积
		空气质量
	社会公平	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高生活成本拖累城市生活质量满意度提高》，载《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7期第27页。

(二) 社会保障、自我保障、资产跨期配置与生活质量

根据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结合我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特点,我们认为保障程度大小会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为了分析保障层次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我们沿着从被动性保障到主动性保障的主线将与生活质量相关的保障分为三个层面,即社会保障、自我保障与资产跨期配置保障。各种保障措施的实施及保障水平的提高既能使居民心里感觉踏实,提高主观感受的幸福度,同时也能提高居民收入,提升经济保障能力。其中,社会保障可以看成是基本生存和“兜底”性的保障,是保障社会公平和居民基本生存权的普适性做法。从政治层面看,社会保障体现了政治正义,包括权力正义、制度正义和分配正义^[4]。在现代社会,权力正义被认为是公民的一种合理诉求,而非对弱者的慈善济贫;制度正义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是保障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分配正义是指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对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正义性。福利经济学从公平与效率着手,认为社会保障是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做法,但同时强调,在保障公平的基础上要兼顾效率。如果保障过度就会产生社会“养

懒汉”的情况发生,经济运行就会失去效率。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兼顾公平与效率尤为重要,要在财政能力允许范围内社会保障“保基本”,并通过个人的自我保障对社会保障进行补充。这样,自我保障就成为公民通过主动作为提升自我抵御风险能力、提高生活质量、积极面对生活挑战的一种做法和态度。居民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加雄厚和多元的经济基础,为自己的未来生活质量提高背书,这更能体现生活质量的提升。资产跨期配置保障则是基于不同时期跨期资产配置而提升整个生命周期内幸福程度的调剂性措施,是更为积极主动的行为,也体现了金融手段对个人资产跨期的调配能力。社会保障和自我保障是常见的保障行为,是大家较为熟悉和理解的保障活动,而资产跨期配置为何具有保障能力,如何实现保障则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为此,下面着重就资产跨期配置保障的运作机理做进一步的分析。

在现代社会,居民通过金融活动来增加自身效用,提升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选择,可以将其看成是一种社会保障、自我保障基础上的一种更为主动的提升生活质量的行为,在这些金融活动中,与生活质量提升关系最密切的是消费信贷。因此,本文将消费信贷也作为替代变量来研究金融资产跨期配置对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金融的核心功能是资源配置,消费信贷作为一项与居民有关的金融活动对优化消费者的资产配置,平滑消费具有重要作用,是帮助消费者克服流动性约束,调整资产在不同期间配置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消费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建立在理性预期基础上的生命周期理论是解释居民消费行为和跨期资产配置的重要理论基础。莫迪里安尼 Modigliani (1954)^[3]对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后在 Samuelson (1969)^[6]、Merton (1971)^[8]、Courinchas & Parker (2002)^[42]的进一步扩展下加入了金融要素,使得生命周期理论与金融实现了结合,由此得出的消费者预算约束下的最优消费决策模型为:

$$\text{Max} E \left| \sum_{t=0}^T \beta^t u(C_t) + \beta^{T+1} v(W_{T+1}) \right|,$$

$$W_{T+1} = (W_t + Y_t - C_t)R - B_t R_b, (t=0, 1, 2, 3, \dots, T), W_{T+1} \geq 0$$

在该模型中, β 是衡量消费者对时间偏好度的指标,函数 $u(C_t)$ 表示消费者现期消费的效用大小, $v(W_{t+1})$ 表示消费者继承的遗产为其产生的效用, W_t 表示消费者当期财富, Y_t 表示消费者当期产生的收入, R 表示消费者当期的财产投资收益, B_t 及 R_b 分别表示消费者当期持有和归还的债务本金及利息。该模型表明,家庭消费及金融决策活动可以通过不同期限的资产配置,运用借贷等工具来实现。消费信贷可以成为财富跨期配置,增加消费,从而提升生活质量的源泉和动力。

(三) 社会保障、自我保障与资产跨期配置保障的作用机理

以上理论归纳和分析发现,社会保障是基本保障,通过“保基本”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可视为全体公民生活质量整体水平的基本保障,也正因为有社会基本保障的“兜底”功能,居民能将当期收入更多的用于消费,从而提升生活质量;自我保障是对社会保

障的充实,是居民积极主动的有效作为来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个体的自我保障能力,以求获得更高层次的消费能力来提升生活质量;资产跨期配置是运用金融手段将资产在生命周期内分配,平滑自身的消费能力,提升整个生命历程的生活质量做出的一种选择。这三种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的保障行为相互补充,构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三轮驱动”呵护居民生活质量的体系。这一理论分析结果当然就成为本文梳理出的支撑本文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这一基础保证了下文实证研究的可行和有效。我们将这一理论研究结论可以用图 2 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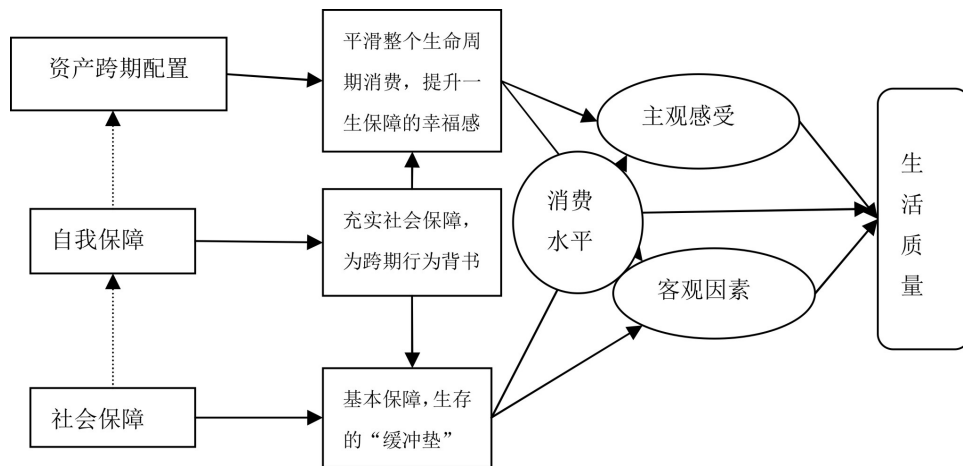


图 2 消费视角下社会保障、自我保障影响生活质量机理

图 2 表明,社会保障、自我保障、资产跨期配置保障从不同层面提升了居民的主观感受和客观保障,从而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其中社会保障是基础,是生存的“缓冲垫”。跨期配置是提升整个生命周期生活质量的调剂性措施。自我保障是社会保障的补充,并为跨期配置保障的实施“背书”。保障能力的提升,提高了居民的消费水平,满足了居民的效用,提升了幸福感,从而提升了生活质量。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是探讨伴随我国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保障性因素,探讨是社会保障对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即提升居民幸福感贡献较大还是居民自身的保障投入较大,或者进行金融性的资产配置对提升居民生活质量贡献较大。我们以研究目标为指引,通过对有关消费基础模型的拓展和延伸,在此基础上构建以下实证模型:

$$Y_{it} = c + \alpha Soc_{it} + \beta Sel_{it} + \gamma Cre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在模型(1)中, Y 是表示居民生活质量的变量,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在这里,我们认为,居民生活质量高低可以通过其消费结构反映出来,如果“享受型、娱乐型”的高端消费支出多,说明其生活水平较高,生活质量较好;如果满足基本生存的衣食住行等“温饱型”的低端消费

较多,则居民生活质量较低。考虑到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实际,我们选择居民交通通信支出作为居民生活质量高低的代理变量。因为交通通信支出反映了居民外出旅行,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等高端需求支出和享受型支出,其消费量的大小能够较好地反映居民生活质量高低;Soc表示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大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择居民转移性收入作为代理变量。在统计数据中,居民转移性收入包括养老及离退休金、社会救济收入、辞退金、失业保险金、赡养捐赠收入、提取的住房公积金等,其中养老退休金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用居民转移性收入表示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是合理的;Sel表示居民自我保障的支出,这里用居民参加的商业保险及个人缴纳社会保险的支出之和表示;Cre表示资产跨期配置的变量,用居民消费贷款的多少来表示,因为消费贷款是目前居民跨期资产配置的一种主要方式。 μ 表示截面间的不可观测值, ε 表示非特异性产生的误差, α 、 β 、 γ 、 θ 、 μ 、 ω 为各变量的系数,i代表截面样本,表示我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t代表年份,范围包括2000-2014年15年的数据。

另外,为了提高核心变量的参数估计精度,我们选择了居民收入Inv、居民素质Edu、消费习惯等三个控制变量。其中居民收入用居民主动性收入(居民总收入-转移性收入)表示、居民素质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消费习惯用滞后一期消费来表示。加入控制变量后,模型扩展为:

$$Y_{it}=c+\alpha Soc_{it}+\beta Sel_{it}+\gamma Cre_{it}+\theta Inv_{it}+\mu Edu+\omega Y_{it}(-1)+\varepsilon \quad (2)$$

同时,为降低异方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取对数后的回归模型为:

$$\ln Y_{it}=c+\alpha \ln Soc_{it}+\beta \ln Sel_{it}+\gamma \ln Cre_{it}+\theta \ln Inv_{it}+\mu \ln Edu+\omega \ln Y_{it}(-1)+\mu_i+\varepsilon_{it} \quad (3)$$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于2000-2014年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的数据缺失较多,不包括在研究范围之内)城镇居民所做的调查。具体为:2000-2004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2005-2011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2-2014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住户调查年鉴》,另外,还有部分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为消除物价变动对数据的影响,除教育年限外的所有数据均根据历年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数据整理后,我们将各变量的整体情况予以呈现,其可以用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来表示(见表2)。

表2 变量取对数后的描述性统计值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y	生活质量	450	6.974	0.671	5.506	8.426
Soc	社会保障	450	8.081	0.602	6.652	9.563
Sel	自我保障	450	6.902	0.735	5.195	8.459
Cre	资产配置	450	4.760	0.526	8.143	10.223
Inv	居民收入	450	9.151	0.526	1.246	10.464
Edu	人口素质	450	2.109	0.124	0.693	2.512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在输出回归结果前,做了以下工作。首先,为检查序列的平稳性,防止发生“伪回归”,对面板数据序列采用 LLC、PP、KPSS 等方法进行综合单位检验,检验结果发现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均平稳,即存在一阶单整 I(1)。其次,采用 Hausman 检验判断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还是随机效应(RE)模型,判断结果支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因此,下文的报告结果均为固定效应模型下的回归结果。

对全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消费金融关系进行回归,并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来验证模型的稳定性,得到以下回归结果(见表 3 的模型 I- IV)。

表 3 社会保障、自我保障与居民生活质量关系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V
LnSoc	0.452(0.000)***	0.297(0.000)***	0.277(0.000)***	0.198(0.005)***
LnSel	0.546(0.000)***	0.197(0.000)***	0.200(0.000)***	0.199(0.000)***
LnCre _t	-0.007(0.324)	-0.011(0.108)	-0.012(0.064)**	-0.012(0.045)**
LnInv		0.646(0.000)***	0.597(0.000)***	0.574(0.000)***
LnEdu			0.512(0.007)***	-0.402(0.062)*
LnY (-1)				0.146(0.036)**
C	-0.416	-2.654	-3.129	
AdjR ²	0.952	0.961	0.962	0.963
F	281.489	338.858	334.032	315.12
P (F)	0.000	0.000	0.000	0.000

说明:*、**、***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P 值。

表 3 回归结果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后所有变量均显著。据此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居民社会保障与自我保障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值,其系数分别为 0.198 和 0.199,表明社会保障和自我保障均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第二,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社会保障和自我保障对居民生活质量的贡献趋于相等,表明居民生活质量高低与两种保障的贡献大小相差无几;第三,通过消费贷款进行跨期资产配置活动对居民的生活质量影响的系数为负,表明消费贷款对消费质量具有反向作用,也就是说,越是贷款消费多的居民,其生活质量也越差,通过消费信贷并未提高居民消费质量,这也许是因为贷款消费者大多数为“低收入者”的缘故吧;第四,从控制变量来看,我们也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发现,即教育与居民生活质量负相关,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可能越穷”,这也许就是民间“读书无用论”说法产生的原因。这一现象需要引起足够地重视,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导向存在问题。

全国样本区域间差异可能较大,为了进一步了解区域异质性,获得更加明细的信息,我们将我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后进一步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4),看在不同经济增长水平的区域,居民社会保障、自我保障及资产跨期配置保障对生活质量的影

表 4 分区域的社会保障、自我保障与居民生活质量关系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I			模型 II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LnSoc	0.259**	0.594***	0.361***	-0.066	0.189***	0.167***
LnSel	0.641***	0.409***	0.593***	0.193**	0.129**	0.165***
LnCre _i	0.002	-0.028***	-0.002	-0.001	-0.010	-0.001
LnInv				0.252**	0.338***	0.163*
LnEdu				-0.638*	-0.319	-0.138
LnY (-1)				0.646***	0.399***	0.502***
C	-0.499	-0.561	-0.047	0.849	-0.565	-0.194
AdjR ²	0.939	0.968	0.946	0.972	0.979	0.971
F	215.449	366.706	214.801	337.038	409.463	302.766
P (F)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说明: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P 值。

表 4 的回归结果表明: 第一, 从系数看, 社会保障对东部地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为负, 表明东部地区居民并未依赖社会保障来提高生活质量, 这可能与东部地区居民总体收入较高, 能通过自己主动性收入获得较好的生存状态有关。当然, 这一结果的统计意义并不显著; 而社会保障对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影响为正, 表明中西部地区居民对社会保障提高生存质量依赖较大, 而且中部略大于西部, 其统计结果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区经济较西部地区发达, 企业职工较多, 靠养老金、退休金等生存的人数较西部多有关; 第二, 自我保障对生活质量的影晌东部大于西部、西部大于中部, 表明东部地区居民生活质量相对于中西部更依赖于自我保障, 这同样也是与其主动性收入较多、自我保障能力强有关; 第三, 消费信贷与东、中、西部地区居民生活质量均为负相关, 但这一结论不显著; 第四, 教育与生活质量负向关, 而且东部的系数大于中部、中部又大于西部, 表明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 生活质量越不依赖于“学历”。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上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 根据实证及理论分析结果, 可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 从全国整体看, 社会保障与自我保障是影响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且其影响呈稳定的正向促进作用。我们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实证分析核心变量社会保障与自我保障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情况, 发现社会保障与自我保障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值, 其系数值分别约等于 0.2, 而且在加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 这一结果较稳定, 说明这一统计结果较为可靠。其经济含义为, 当社会保障或自我保障投入每增加 1 个百分点时, 居民生活质量水平会提升约 0.2 个百分点, 即增加 20%。因此, 生活质量对其自变量社会保障和自我保障反应敏感, 提升社会保障和自我保障水平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路径。

第二,当前社会保障与自我保障对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从全国整体看几乎相当,但分区域看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居民社会保障与居民生活质量负相关,而与自我保障正相关,表明东部地区居民由于整体收入水平高、经济来源广泛,并未依赖国家基础性的社会保障投入提高生活质量。相反,他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主要靠自我保障和增加自己现期收入形式实现。这同时也说明现阶段我国基础保障水平较低,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尚不能成为为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促进手段。中、西部地区则不同,中西部地区居民生活质量高低既依赖社会保障又依赖自我保障,且社会保障对生活质量的贡献大于自我保障。表明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较东部地区薄弱,居民收入水平有限,社会保障对提升其生活质量效果较明显,同时,中西部地区居民也并没有放弃通过自身努力提升自我保障水平,从而提升生活质量。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差异验证了我们前文所分析的区域异质性的存在。

第三,消费贷款并未帮助城镇居民提高生活质量。在居民跨期资产配置中,消费贷款是主要的金融手段。通过消费贷款的获得提升现期消费水平是一种重要选择,也是平滑一生消费的重要调剂手段。但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消费信贷并未帮助居民提高生活质量,这可能跟我国当前贷款消费者主要为“低收入者”有关。相对于高收入群体,低收入者取得消费贷款往往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而不是一种积极主动提升生活质量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贷款是为了保持基本生存而取得的,当然并未对大幅度提高生活质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跟以往研究结论类似,居民日常收入高低、生活及消费习惯也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但本文的研究同时发现,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消费者并未得到比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者的更高质量。也就是说,教育水平高低并不是当前影响我国居民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这一结果可能跟我国当前的分配机制有关,现有机制下学历较高的人员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比不上农民工的工资就是最生动、最直接的体现。我们虽然并不相信“读书无用论”,但国家层面应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引导收入分配走向正确的轨道,帮助高素质人才获得更加安逸的生活。这是鼓励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求实创新氛围的需要,也是体现劳动价值、特别是人资本价值的需要,更是提升让高技术、高学历、创新性人才的生活质量和形成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需要。

(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理顺社会保障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工业革命后虽然各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但诱发职工伤残、疾病、工伤、死亡、失业等的风险因素也越来越多,从我国实际看,现阶段诱发风险的因素也与日俱增,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机制与体制十分迫切,社会保障机制与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是开展社会保障工作的基础。社会保障机制是与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资金使用及其社会保障投入运行相关的体制,是对社会保障的思路、框架、资金分担等运行机制等的顶层设计,它廓清了社会保障运作的基本机理。社会保障制度则是包含一系列运行规则、法律的制度体系,是保证社会保障工作平稳运行的必备条件,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等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近年来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我国社会保障的运行机制还不顺畅、制度尚不完善,各种制度的协调性不高等诸多问题。国家要下大力气要统筹兼顾做好这些基础性工作,为建立与我国经济水平相适应的普适性社会保障体制机制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全面覆盖社会保障的兜底功能,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社会保障是居民生存安全的“缓冲垫”,做好基础的社会保障就是保障社会的稳定,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经济基础仍然薄弱,要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水平是不现实的,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忽视基础社会保障的借口。相反,我们有很多的欠账要补,要加大财政、国企利润投入居民基础社会保障的力度,让人民群众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这种实惠反过来也会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能力的提高,消费水平和质量的上升有利于刺激和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行,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国社会保障区域不均衡、不同群体间不均衡现象比较突出,这种现状不改变,既有失社会保障的公平功能,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安定团结。

第三,要鼓励居民多渠道增加收入,积极增强自我保障,从而提升生活质量。社会保障与自我保障是相辅相成的,在不降低生活质量的情况下,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居民自我保障压力越小。相反,居民自我保障水平越高,社会保障的压力也会降低,而且不会降低居民生活质量。居民的自我保障能力提高主要依靠拓宽居民的收入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来源及在此基础上的提高居民收入来实现。在我国现阶段,居民的收入来源渠道主要是劳动报酬,因此,拓宽居民收入来源要依靠提高增加居民的资产性收入,如证券收益、资产出租收益等。国家目前也在积极倡导通过增加居民资产性收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提升生活质量,希望从政府层面做好制度安排,完善合法性收益的法律保护等措施能进一步跟进。此外,从劳动收入来看,我国居民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要调整劳动收入在收入分配比重中的份额,增加劳动收入总额。此外,居民个人应通过参加社会保险、购买职业年金等来增加自我保障能力,这些措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是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向。

第四,合理适度的发展消费信贷,引导居民适度负债,从而平滑生活质量的时间差异。居民终身幸福是每一个公民和政府决策者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但从居民个人层面讲,在其一生中收入是不均衡的,在某些年龄段,可能消费欲望较高但收入水平较低,某些年龄段收入水平较高,但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这就需要通过资产的跨期配置来平滑个人一生的消费,如通过贷款、购买保险等进行长短期调剂,其中消费信贷是最主要的金融手段。为了保障生活质量不大起大落,国家应建立完善的消费贷款制度,在此基础上引导居民适度负债。当然,消费信贷的发展要有序有度。既不能因为过高的负债造成生活负担,也不因为回避负债而影响近期生活质量。当然,消费贷款这种跨期配置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当,风险控制严格,可以提升终生生活质量总水平,但若过度使用,则将给自身带来更大的危机和压力,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风险。

第五,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与制度,鼓励居民通过踏实劳动提高收入,提升生活质量,特别是要创造高素质人才通过贡献聪明才智获得更体面生活的通道。我国虽然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分配制度,但在实际分配中,按劳动价值分配与资本等要素分配相比份额小、比例低。这种分配状况会打消劳动者积极性,特别是对那些高素质人才,虽然是我国迈向创新性大国的中流砥柱,但他们的劳动所得并未完全体现为他们的价值,表现为消费能力没有大幅度的提高,这不利于他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因此,要对我国的收入分配机制进行彻底改革,鼓励民众通过提升自身素质、通过勤奋劳动来获得较高的收入的同时要避免助长投机式的虚拟炒作者获得高收入局面的延续。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会形成踏实奋进、积极向上的氛围,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风气才可能形成。

参考文献:

- [1] J.M.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M].MacMillan,London,1936.
- [2] J.S.DUESENBERY.Income,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
- [3] MODIGLIANI,FRANCO,RICHARD BRUMBERG.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M].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4.
- [4] K.DYNAN.How Prudent are Consumer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6):1104-1113.
- [5] R.E.HALL,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Life Cycl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Theory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8(6):971-987.
- [6] P. A. SAMUELSON. Lifetime Portfolio Selection by Dynamic Stochastic Programming[J].Review of Economics Statistics, 1969(51):239-246.
- [7] R.C.MERTON. Lifetime Portfolio Selection under Uncertain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9 (151):247-257.
- [8] R.C.MERTON. Optimum Consumption and Portfolio Rules in a Continuous-Time Model[J]. Journal of Economics Theory,1971(4):373-413.
- [9] P.COURINCHAS and JA PARKER, Consumption over the Life Cycle[J].Econometric,2002(70):47-89.
- [10] L.GUIISO,T.JAPPELLI. Household Portfolios in Italy[A].Household Portfolio, Edited by L.Guiso,M.Haliassos, and T. Jappelli,MIT Press,2002:251-290.
- [11] B.A.CARDAK,R.WILKINS.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Risky Asset Holdings:Australian Evidence on Background Risk and other Factors[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9(33):850-860.
- [12] J.Y.CAMPBELL.Household Finance,Journal of Finance,2006,61:1553-1604.
- [13] DVORNAK,N.& KOLHER, M., Housing Wealth, Stock Market Wealth and Consumption:A Panel Analysis for Australian [J]. Economic Record,2007(83):117-130.
- [14] GAN, J. Housing Wealth and Consumption Growth: Evidence from a Large Panel of Housholds [J]. Reviewing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23):2229-2267.
- [15] J.D.OSTRY & LEVY, J. Household saving in finance: Stochastic Income and Financial Deregulation[J].Staff Paper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5(42):375-391.
- [16] A.DEATON,The Analysis of Household Surveys[M].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 [17] T.JAPPELLI. Who is credit Constrained in the U.S. Economy[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105): 219-234.
- [18] FELDSTEIN M.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5):231-242.
- [19] LEIMER D.R,LESNOY S.D.Social Security and Private Saving:New Time Series Evide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2(3):606-629.
- [20] 姜百臣,马少化,孙明华.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32-39.
- [21] 段景辉,黄丙志.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J].财经论纵,2011(3):44-49.
- [22] 刘新,刘伟,胡宝娣.社会保障支出、不确定性与居民消费效应[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4):49-55.
- [23] 肖攀,李连友,苏静.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门槛效应与区域异质性[J].软科学,2015(6):15-18.
- [24] J.K.GALBRAITH,The Affluent Society[M].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1958.
- [25] AMOLD.Measur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Frail Elderly[C]//J.E.Birren(ed.) Th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Frail Elderly.San Diego,CA:Academic Press,Inc,1991:55.
- [26] GEORGE & BEARON.Quality of Life in Older Persons: Meaning and Measurement[M].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uman Sciences Press,1980.
- [27] LAWTON, M.P., MOSS, M. and GLICKSMAN A. The Quality of the Last Year of Life of Older Person[J].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1990(1):1-28.
- [28] 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高生活成本拖累城市生活质量满意度提高[J].经济学动态, 2012(7):25-34.
- [29] 李建新,李嘉羽.城市空巢老人生活质量研究[J].人口学刊,2012(3):31-41.
- [30] 梁增贤,黎结仪,文彤.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生活质量感知研究[J].旅游学刊,2015(9):72-81.
- [31] 蒋青.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J].财经科学,2004(1):118-121.
- [32] 吴静.城乡居民幸福测量的结构方程模型[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9(4):66-72.
- [33] 何强.全球居民幸福度与人均收入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J].调研世界,2011(3):52-60.
- [34] 方显仓,王昱坤.社会保障、预防性储蓄与上海居民消费[J].上海经济研究,2013(10):75-84.
- [35] 贾春水,熊忠东.城市社区医疗服务多元供给模式探究[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0-38.
- [36] 姜大明.把群众利益作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社会的切入点和落脚点[J].求是,2007(2):22-23.
- [37] 风笑天.生活质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J].社会科学研究,2007(6):1-8.
- [38] 冯立天.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64-66.
- [39] 林南,王玲,潘允康,等.生活质量的结构与指标[J].社会学研究,1987(6):73-89.
- [40] 卢淑华,韦鲁英.生活质量与人口特征关系的比较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3):58-69.
- [41] 张守夫.社会保障的政治哲学基础:正义诸原则[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127-130.
- [42] P.COURINCHAS and J.A PARKER, Consumption over the Life Cycle[J].Econometric,2002(70):47-89.

责任编辑:梁雁

Social Security, Self-safeguard and Quality of Residents' Lif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WANG Ping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Gansu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nstitute,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which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will become more than ever. The perfect securit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resolv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beneficial to the stability of social order.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establishing a multi-level and diversifying security syste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and it will become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protect people's livelihoo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logical mechanism of "three-wheel drive"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quality of residents' life is a concept related to the happiness of them, and happiness is the result of satisfaction degree. Consumers' spending is the main path to meet the utility of the consumer. Under the support of this theory,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provincial urban residents from 2000 to 2014 and following the main line from passive guarantee to active guarantee, the paper takes the social security, self-security, and asset inter-temporal allocation as the core to explain the variables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social security and self security have almost the same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but there a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in eastern China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self-security, while resident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depend on social security. The provision of inter-temporal asset allocation does not help the urban resident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possible reason may be the "low income" consumer is the main force of loans in China. Residents' active income level and living habits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life, but the higher education level did not give residents a high quality of life, and in the areas mor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this phenomenon is more obvious. According to these conclusions,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given as follows. China should fully cover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security to protect the basic rights of the people at the current stage. Resident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raise funds in various channels and actively enhance the self-protection capacity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Moderate consumer credit should be developed. Through the asset allocation, the time difference of distribution of life within the life cycle of the whole life should be smoothe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whole society respect labor, residents are encouraged to create happiness through a variety of intellectual and non-intellectual work and finally improve the life quality.

Key words: social security; self security; inter-temporal asset allocation; consumption loan; quality of life;